

贫穷：难以逾越的鸿沟

农民工群体的生存与迷失

■ 记者 蔡梦葵 报道

农民工工资高：看上去很美

在现实生活里，目前不少单位给农民工开的工资目前已与城里人旗鼓相当，一些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的薪水甚至比应届大学毕业生都要高不少。而他们的生活，却与片中的人们相差不大，因为所付出的，却远比城市人付出得多。

以国内某知名合资汽车厂及同样是外资的关键零部件配套厂为例，虽然那里的产业工人的月薪随便能拿到三千元左右，但工厂的机制却是三班倒，隔一段时间，工人便会被轮到上夜班。同样地，富士康、广达等世界五百强电子工厂中，产业工人即便每个月可以收入三千元甚至还要高，但他们的“高收入”往往都是靠赚取加班工资而组成。据知情人士透露，2012 年，某世界五百强电子工厂的转正后底薪一般在 2000 元 / 月，加上加班工资一般在 3000-4000 元 / 月。尽管严格限制加班，但不少产业工人仍希望多加班以赚取更多的钱。

资料显示，经常性地倒换班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这种情况造成机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久之就会造成抵抗力下降，容易诱发经常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同时有损伤肝功能。前不久，便有一名富士康员工在夜班之后，在澡堂里猝死。而产业工人因长期劳作而“过劳死”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个案。

事实上，类似于富士康一类外资工厂，还算善待产业工人的。

据记者了解，我国一些本土民营生产企业，会要求产业工人从事两班倒、一班 12 小时的工作机制，且无偿加班是常有的事，十分辛苦。这让这个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们无法坚持，而企业不给签约、买社保更让他们无从找到归属感。加之他们本身居无定所，常年漂泊他乡，频繁换工作就成了容易的事儿。

2012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公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表明，“短工化”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 2 年，他们初次就业的时间越靠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就越短。这种现状，农民工更难在工作中有所发展和进步。

因此可见，农民工的收入尽管比大学生们还高，工作也相对容易找到，但他们所获取剩余价值，却比城里人和有知识的人更少，也更困难，有时甚至关乎生死。

留下或回家：进退两难的迷失

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9 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同日，胡锦涛签署第 46 号主席令，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农民回乡种田，将取得优于以前的效益。当时有报道称，全面取消农业税，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位农民说：“取消农



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给农民最大的一项优惠政策，我家 46 亩地一年就能减免近 4000 元钱。我和周围的乡亲们从心里感激党和政府，现在大家都干劲十足，一心抓粮食生产。”然而，截止如今，每年东南飞进城打工，仍是不少农民的首要选择。

河南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据河南省劳动保障厅劳务输出服务处统计，河南省农村有 4725 万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者有 1500 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有 3200 万人。目前，河南已经转移输出劳动力 2100 万，其中有 900 万人在河南省内务工，每年向外输出的劳动力则在 1200 万左右，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十分之一。

2008 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双转移”的导向性政策，即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内地转移，让农村劳动力向流出地转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2008 年 12 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11 月底，十省份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 485 万名，占 2008 年 9 月底外出务工人员 5.4%。十省份为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省，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其中河南省 11 月底前提前返乡人数达 107.5 万。

不过，大多数返乡农民工仍愿意到河南本地的工厂上班，如富士康在河南投资的手机生产线，而并不愿回家种田。这主要在于河南位于中部平原，以现有的农业机械化水平，1000 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已经足够。而且不少农民工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并不愿意或者根本不会务农。而且即便返乡，由于农民工长期在外，承包地早已经“易主他人”，很可能导致农村土地纠纷的增加。

而作为 80 后、90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面临没法返乡种田的现实。不少新生代的成长背景更为城镇化，他们其中一些幼年时期便被父母接到城里，即便在农村老一辈也舍不得让他们干农活。其次，他们大都受过

九年义务教育，不少还在职高、技校里受过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18 岁便进厂打工，务工所需要的知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可谓“一片空白”。而在城市就业，由于所受的教育无法与城里的孩子比拟，他们仍只能做父辈做过的工作，仍要面临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他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他们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民。

消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目前在 1.5 亿跨省流动农民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 9000 万。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 800 万 ~ 900 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要不了 10 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 2 亿甚至更多。随着这一群体人数的增加，这“迷失的一代”所承受的痛苦不仅越来越大，这种迷失，也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痛。

城市高成本：大多数人的悲剧

不仅仅是对农民工，城市的高成本，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所有人无疑都是一种威胁。

以上海市为例，据统计，目前上海核心区域如卢湾、黄浦、静安、徐汇等，房价普遍在 35000-40000 元 / 平方米，有的区总价价格早已破四万，略偏一点的如浦东新区全境、闵行区、杨浦区等，房价也在 25000 元 / 平米以上，价格在 30000 元 / 平米以上的房子更是随处可见。即使是嘉定、松江、金山等地区的房价也在一两万每平。而通过上海市政府官方数据汇总的 2012 年上海市月均工资仅 4331 元，年平均工资为 51968。也就是说，根据有统计的数据，且达到平均线，在上海上班一年不吃不喝，仅能在主城区购买不到两平米的房子，在郊区只能购买不到 5 五平米。

即便是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上海白领月薪平均 7112 元，假如两个白领成家，一月不吃不喝也只能去金山买一平米。而对于那些外来务工者而言，上海的房价更是在天

上。据称，上海一般的技术工人月工资都有 2000 到 3000 元左右，个别高的也就刚超过 4000 元。要在上海买房安家近乎于神话。

不只是房价，上海的其他物价近几年也因为房价、地价、租金的提高而被推高。据一名在上海工作、月薪能达到七八千的外企技术人员透露，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不时有老家的人到上海来参观，他们在接待亲戚朋友时不免要带到上海小有特色的餐馆去吃饭，但四五个人吃一顿下来都一千元以上，请不了几次，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就快没了。不少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中午也只敢在路边摊吃一碗素的兰州拉面，但即使这样，也要十多元。一名在上海工作的山东人向记者表示：上海最便宜的餐馆，现在来看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

而对于收入更低的外来产业工人而言，随着近年物价一路飞涨，更让不少求职农民工觉得虽然上海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比老家好，但相对于消费水平来说工资太低。加之一些世界 500 强企业在内陆省市落户，更让他们索性回到本省找工作，至少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不过，大城市物价高的现状，对于大学生和本来就生活在那里的人这类社会夹心层，无疑也是十分严峻的威胁。

贫富差距乃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城乡二元人口的贫富差距，也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农民和农民工的贫穷，在全亚洲以及全球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以印度为例，作为世界主要农业国之一的印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全国 10.2 亿人口中，有近 7.3 亿人生活在农村，直接或间接以农业为生。尽管印度拥有令世人羡慕的土地资源，历届政府也无不将农业置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

但即便如此，印度农民的收入仍无法与城里人相提并论，根据权威机构调查，印度

城市里收入较高的家庭年均税后收入在 3375 万卢比到 15 万卢比之间（1 美元约为 48 卢比）；而在农村，一个农民每年要在地里劳动 150 天，每天的收入在 60—80 卢比之间，一年下来才挣 9000—12000 卢比，其中八成以上用来应付家庭开支。

目前，印度全国有 2.6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收入不足 1 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保险，而且还喝不上卫生的饮用水，至今仍有 500 万家庭直接饮用河水和池塘的水。在通电问题上，城乡差距尤为巨大。有调查表明，目前印度 88% 的城市居民家里都有电，而对于 56% 的农民来说，电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迄今，煤油灯仍是农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

究其原因，目前众多印度小农户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土地面积过小，购买力弱，没有能力进行现代技术投入，也缺乏获得信贷、技术、道路、市场、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的现代渠道。此外，由于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印度农业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在一些偏远地区，农业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面对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他们的农产品毫无竞争力可言。这让贫穷地区的农业经济形成恶性循环，也导致人们很自然地从落后地区向城市等较发达地区流动。

根据印度最新统计数据，终身流动人口总量将近全国总人口的 27.4%，农村是人口流动的发源地和目的地，共有 70.5% 的国内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中，农村流到城市的占将近 48.5%

1949 年制定的印度宪法第三章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因此印度的人口流动在法律上不受任何约束。为确保外来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印度政府曾在 1979 年通过立法，规范农民工的就业和服务条件，要求城市的雇主需提供给农民工与城市人口相同的待遇与福利，不能区别对待。不少家庭也靠家人打工的汇款，开始脱贫走向温饱。

然而，由于农民工的就业仍主要在各大城市建筑工地、工厂流水线、小商贩、家政服务、清洁行业等基础性行业，这也让他们的工资并不能与城里人媲美。而且，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印度的城市也跟中国的大城市一样不堪重负。

资料显示，在过去 10 年中，印度大城市贫民窟人口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以首都新德里为例，它的总人口近 1200 万，其中贫民窟人口从 224 万增加到 326 万。而号称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的孟买的贫民窟人数从 430 万增加到 585 万；加尔各答从 362 万增加到 431 万；其他三大城市金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贫民窟人口也都达到了 100 万左右。在贫民窟内，缺水、少电乃家常便饭，卫生条件极差，新生儿死亡率非常高。

而印度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如家常便饭，电影《三峡好人》中农民低层次的、漂荡不定的生存状态，在不少国家都具有普遍性。而农民的贫穷，农民工的悲哀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家似乎都暂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农民工：高薪背后是高辛

■ 记者 王红英 报道

日前，有网友晒出建筑工地的“民工工资单”，最高过万元，最低也有 5000 多元。记者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真实工作情况并非像网友晒出的那么“美好”。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伤病时是否能享受到医疗保障？是否为年老之后没有社会保障而忧虑？

记者走访工地发现，工资条上的薪金水平基本属实，但为了拿到这个薪水，工人们每天起早贪黑，几乎没休息日。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等存在普遍现象，有的工种甚至存在高风险，拖欠工资也是常有的事情。等等。作为建设城市的生力军，他们虽然拿着“高薪”，但也是一群“高辛”人群。

高风险 拖欠工资

“我们做的许多活都不能按时发工资，好的拖欠几个月，有的甚至要拖欠一两年，别人看起来还不错的工资实际上兑不了现。”在石羊场一家建筑装饰工地，来自四川巴中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等活靠运气，但是按时拿工资也是需要靠运气。

王先生的工友告诉记者，外出打工，他们身上带的钱本就不多，在付出辛苦劳动、工资被拖欠后，生活就更加拮据。生病了不

敢去医院，医院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的医院他们承担不起，生病了只能随便吃点药挺着，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

记者了解到，虽然明面上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不低，但这是日工资。“农民工多是户外作业，工资按天发放，遇到下雨、下雪等不能上工的天气，是没有工资的。”同时农民工的工资多半是工程完了才能结清，有的还得分几次。“去年 7 月份做的活，5 万元的工资到现在我才拿到 4 万多万元。”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因为要赶工期，他们往往需要加班。在烈日下很容易脱皮，各种器官受损，甚至有有毒有害的恶劣环境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事实上，拖欠工资已经是建筑行业不争的事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层出不穷，欠薪者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农民工的工资。讨薪的新闻多了，舆论多少开始变得麻木，讨薪的农民工必须拿出“行为艺术”的“范儿”才能引起关注。因讨薪丢失生命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另外，农民工所处的工作环境危险重重。每年媒体报道的建筑业安全事故不断。据了解，媒体报道的那都是重大事故，一般的“小事故”没有端上台面，每家公司一年里都会有一些小的事故。比如摔断了手脚、摔坏了内脏……这些伤残农民工如果遇到无良老板，往往会被威逼利诱。结果是事故被隐瞒，伤残者得到一笔不足以弥补损失的抚

恤金。农民工们都知道上了脚手架，就意味着不一定能好手好脚地下来，可是为了生活，他们只能上。

再者，在工资之外，两者的工作机会和晋升空间也大不相同。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上班意味着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地从事同一工作，直到年老体弱，且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

劳动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

“我们干活都是临时性的。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也许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王先生说，一般一项工程干完不一定能接下一个活儿，常常要等两三个月找活儿，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收入的。王先生说，“说白了我们干的就是苦力活儿。”

“我们干活一般都是早上 8 点开始到晚上 8 点才能收工，工作时间很长。”来自广安市的张女士告诉记者说，我们不仅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强度也很大，在成都的许多建筑公司，像我们这样每个月工作 30 天的建筑工人比比皆是，不过大家也不愿意休息，因为我们的工资是按天计算的，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钱，休息就没有钱可拿。

在张女士打工的成都华阳建筑工地，工地的负责人表示，“像现在这么热的天，工人们吃住就在路边的简易帐篷里，就这份罪也

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农民工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及休息权都很难得到保障，因此更少能从工作中获得赚钱之外的乐趣与成就感，大多数拿到钱就寄回家了，供老家的孩子上学，生活之用。

记者走访发现，虽然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有所提高，但掩盖不了其工作的重复性、单调性，以及上升渠道不畅、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以搬砖工为代表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条件艰苦，一般都是室外作业，风吹日晒，冬有严寒、夏有酷暑，个中辛酸是在办公室吹着空调上班的白领们难以体会的。

同时，就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言，农民工从早干到晚，几乎挖掘了所有生命潜能。他们包吃包住，不过常年吃的是大锅白菜、包菜，住的是夏热冬凉的工棚，而且常年背井离乡。

据了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休息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劳动法》则具体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同时，也明确了公民依法享有法定节假日的休假权。然而，现实情况是多数农民工成了“法外之人”。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 44 小时的外出农民工占 89.8%。

缺乏福利保障

农民工的工资里往往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据了解，尽管一些农民工拿到手里的现金收入的确不菲，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少五险一金和相应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障。

关于农民工高工资，记者在網上搜索了下，网上的艳羡之声溢于言表，但说穿了，羡慕的不过是薪资数字，而绝非生存环境。“就算如城里人热衷的乡村游，说起来个个无限神往田园牧歌式的‘原生态’，但真要让其置身其间、安享此般‘业态’，恐怕唯恐避之不及了。”一网友如此评价大家对农民工高工资的不理性认识。

应该说，表面上农民工拿着高工资，但依然是弱势的。他们以血汗换来的“不菲收入”，没有改变他们仍然位处社会分金金字塔底层及缺乏归属感的现实困境。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不妨多一些平等的倾听，帮助他们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非总是“由他人代言”。

因此，要想消除“高薪”背后的“酸楚”，应该首先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加大对侵害农民工休息权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比如责令违法违规用人单位支付高额损害赔偿费，责令其停业整顿，对相关负责人予以行政拘留等。